

领导科学丛书

张放涛 主编

人物春秋

杨杰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 物 春 秋

主 编 杨 杰
副主编 赵 森 张国典
王 惠 王 娜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春秋/领导科学杂志社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12
(领导科学丛书)

ISBN 7—80128—514—X

I. 领…
II. 领…
III. 领导科学—文集
IV. C93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021 号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孙 申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61 64924716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549 印张

字 数 1377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688.00 元(全套 30 卷)

领导科学丛书编委会

编委主任 孔玉芳

编委副主任 马正跃 殷安民 申振君 詹玉荣
路俊福 熊金栋 林宪斋 邹文珠
张铁岗 张召平 李恩东 苏万里
李永新 李亚杰 陈雪枫 柴中畅
李发军 王 璇 马葆青 赵金德

编 委 王敬瑞 高丹盈 程六生 张学军
宋建生 姜会峰 鲁在利 陈武营
赵德有 张振涛 赵继清 同志安
严君国 郭克明 李森林 段金生
李庆瑞 徐宏波 薛显林 徐玉芳
邵景均 姜 平 孟艾芳 李光炎
冯志芳 张世和 赵达军 刘兰芬
王修和 高 璞 陈一放 徐仲华

主 编 张放涛

副 主 编 张兴民 姜明生 王玉涵 冯振广

前　　言

领导科学是适应改革开放时期领导工作科学化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第一个阵地——《领导科学》杂志,自1985年3月创刊以来,受到了全国广大读者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和好评。中央领导同志称赞她为“科学决策的参谋,领导工作的益友”;基层干部称她为“科学领导的良师,人才成长的摇篮”;专家学者称她为“学科旗帜,科研阵地”。胡锦涛同志1992年调中央工作之前,曾把他多年保存的《领导科学》杂志送给西藏自治区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并要求他们认真阅读这份杂志。1999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的傅全有同志委托总参政治部复函领导科学杂志社,对我刊多年来为传播现代领导科学知识、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实现决策与管理现代化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衷心感谢我刊对军队建设和总参工作的支持。2002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姜春云同志视察领导科学杂志社时说:“《领导科学》我了解,办得好,很成功,很有特色,很受欢迎……我认为,《领导科学》值得广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各级领导的鼓舞与鞭策,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激励着我社全体同志始终以“树一流品格,创一流刊物”为目标。创刊19年来,我刊先后获得了一系列荣誉:1995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社科期刊奖,连续四届被评定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连续七届获得河南省优秀期刊、二十佳期刊称号。同时,发行量也逐年增加,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拥有数十万以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为主的忠实读者。

由于我们在杂志编辑过程中始终坚持应用性和创新性,我刊过去所发表的文章虽不像陈年老酒愈陈愈有味道,但今天仍有参

考价值的文章确实很多。我们曾多次因不能为读者提供早期杂志而感到遗憾。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迫切需求,我们在征求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该丛书与以往我们出版的几种杂志精选本相比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系统、完整。全书1377万字,共收入1985年至2003年的文章5097篇,不少栏目中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几乎全部入选。二是分门别类,使用方便。根据专业理论和杂志栏目设置的特点,对入选的文章重新进行分类,共分30类,每类1卷。每卷中又分若干部分,每部分中的文章以时间为序排列。全书共30卷,40个分册。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入选文章进行了必要的删改,而对于当时特定环境中的一些具体提法,则本着尊重作者、尊重历史的原则,基本保留了下来。对于一些现在看来失之肤浅但当时处于学术前沿的文章,也没有放弃入选。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对入选文章的作者的情况无法全部了解;二是分类标准的多元化(在这里多元化又是必需的),使编者在操作过程中难以准确把握。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非常感谢多年来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的领导和朋友们;为了提高该丛书的编辑水平,我们特邀省内外有关单位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领导科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本书编委主任、编委副主任、编委以及分卷主编、副主编,对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非常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感谢中国言实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以及为本书出版给予支持的所有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曾经在领导科学杂志社工作过的同志们,本书也有他们付出的心血。

领导科学杂志社

2004年10月

目 录

一、政坛风云

邓小平与澳门问题的解决	张 谦	1
历史上的“朱毛之争”	肖思科	4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三次谦让	裴默农	12
邓小平帮助乔冠华渡难关	章含之	16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缘由	舒 云	21
解密：毛泽东遗嘱	史锋锐	24
张闻天二三事	程中原	31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五步高棋	吴旭君	36
白宫主人与中国	邓 鹏	47
邓小平为中美建交铺就红地毯	钱 江	51
毛泽东与梁漱溟论争的是是非非	尹家民	59
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张映波	65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	马云飞	72
毛泽东初访苏联	尹家民	80
周恩来“辞职”内幕	杨明伟	86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王永钦	94
毛泽东对王明的斗争与挽救	高建平	100
邓小平同志抓整顿的一个范例	陈法文	107
王震在“文化大革命”中	锡 鹏	112
邓小平请工商界五老吃火锅	吴跃农	117
邓小平舌战莫斯科	李越然	122
“总设计师”鲜为人知的中原谈话	薛中原	128
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	梁 丞	136

谭震林与真理标准讨论	薛庆超	141
毛泽东晚年的重要决策	薛庆超	147
在坚持错误中坠落的王明	李东朗	157
昂首于高峰与低谷之间		
——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后	薛庆超	168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最后一次会面	陈敦德	199
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前后	薛庆超	207
《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	苏星	225
围绕邓小平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一场激烈斗争	薛庆超	236
亲历“外交核爆炸”	张锡昌	246
跨越历史的时刻	张庭廷	254

二、领导风范

我给邓小平当保健医生	傅志义	263
一个保健医生眼中的聂帅	傅志义	267
难忘那特殊的一天		
——回忆聂帅对“两弹一星”事业的倾心支持		
.....	傅志义	272
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	林里	275
毛泽东：一位不愿拿枪的伟大军事家	胡哲锋	276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关键时刻	钱江	281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	万绍芬	294
邓小平与毛泽东	齐欣林娟佳盈	300
胡耀邦主政川北时的统战工作	钱江	307
粟裕影响中央战略决策的一次直言	魏白	313
“再见了，我永远是清华人”		
——朱镕基深情告别清华园	曲力秋	319
人民总理的真挚情怀	薛庆超	324

追忆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	傅志义	327
平民总理的情怀		
——温家宝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的领导风范及其启示	程 雄	333
胡锦涛同志领导风格浅析.....	冯胜瑜	339

三、人物春秋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访李德生同志.....	周树林	344
不断追求 不断奉献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	陈 雁	348
梦牵湖海 情系江河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印象.....	陈 雁	352
情系虎头山		
——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斯 君 王娜娜	357
宠辱如烟 政声任人评		
——访修建红旗渠的主要决策者、组织指挥者杨贵同志	斯 君 王秀芳 魏 佳	363
陶勇“马失前蹄”		
——酒友轶事之一.....	水 静	370
廖鲁言“大意失荆州”		
——酒友轶事之二.....	水 静	375
李葆华硬拼受挫		
——酒友轶事之三.....	水 静	379
吕正操高挂“免战牌”		
——酒友轶事之四.....	水 静	384
感慨万端忆酒友		
——酒友轶事之五.....	水 静	387

毛泽东轶事(二则).....	389
我眼中的江青.....	水 静 394
回观陈永贵的从政生涯.....	孔令贤 408
回忆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见贺子珍同志的情形.....	水 静 412
后记.....	429

一、政坛风云

邓小平与澳门问题的解决

张 谦

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一开始也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在解决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两次谈话定政策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首次公开提出要与香港一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在会见接近尾声的时候，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请求邓小平谈谈澳门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用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有利，我还在考虑。”又说：“澳门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的时间比香港早好还是同时，这个问题正在考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的首次公开表态。

邓小平就澳门问题的谈话一传到澳门，立即引起了澳门居民的反响。大多数澳门人对以“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解决澳门问题是接受的。但由于当时许多澳门人对回归的时间尚无充分的思

想和心理准备，对缺乏治澳人才表现出忧虑和不安，因而社会上一时议论纷纷。邓小平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草签后的澳门情况非常关心。在得知澳门居民的一些想法后，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谈话。1984年10月6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内不谈，甚至可以更长些时间不提不谈，请大家放心，继续工作。”“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并指出，“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等等。邓小平的第二次“澳门谈话”，对澳门起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也消除了由于过早提出解决澳门问题可能产生的对解决香港问题的不利影响。

二、从两国战略把握澳门问题

1985年5月21日至26日，葡萄牙总统马略·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葡萄牙国家元首。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表示：“我们之间不会吵架，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埃亚内斯总统亦认为，“澳门问题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达成友好协议”，“我们之间没有吵架”，“我们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我们在本次访华中看到中国也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双方目标一致，就是保持澳门地区的稳定繁荣，维护中国、葡萄牙和澳门人民的利益”。

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先后举行了四轮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葡方在谈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还澳门的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的主张。对此，中方态度坚决。邓小平明确指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面对这样的坚决态度，葡萄牙方面最终同意在

1999年把澳门交还中国。

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葡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

三、以香港过渡期实践为借鉴

邓小平在领导推进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过程中,也不忘澳门问题。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邓小平在指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曾就“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两制”不变、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模式和民主发展、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这些思想,不仅成为中方起草香港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则,也成为后来起草澳门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1993年制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结构、体例到内容,都参考和借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华。这期间,邓小平在具体深入阐述“一国两制”方针时,总是提到澳门。比如,他在阐述“50年不变”的思想时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政策50年不变,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要补充说,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50年也不变”。

1988年起草澳门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

出席第一次草委会的全体成员，并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作出过若干指示。后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草案时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参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

四、晚年记挂着澳门

邓小平晚年不仅深情地关怀着香港回归，也深情地关怀着澳门回归。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部分省市时，曾来到与澳门仅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在珠海经济特区的粤海大厦旋转餐厅深情地凝望不远处的澳门。当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到“您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的话题时，邓小平说：“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其间，还多次围绕着有利于实现澳门回归的话题，畅谈确保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战略意义。

（摘自1999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选自2000年第1期）

历史上的“朱毛之争”

肖思科

1928年4月下旬，经过湘南起义，已拥有中国工农革命军一个师和万余农军的朱德同井冈山工农红军第二团会合后，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红军主力会师。工农革命军的两股力量从此汇成一股——朱毛的红四军，朱德任军长。红四军成立不到半月，便召开第一次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军委书记，兼

任红四军党代表。

5月初，湘赣特委成立，毛当选为特委书记，统一领导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对敌斗争。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担任。6月，原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恢复，朱毛等人当选，毛为书记。特委、前委、军委，几乎一套人马，三套班子，这就为以后的工作潜藏了矛盾。

1929年1月24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毛泽东，率井冈山3600多人向南远征进而扩大红色根据地的空间。

2月初，红四军前委在一个叫罗福嶂的小镇召开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决定：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许多人举手表决同意了，但也有人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直接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也就在这时，前委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的一封来信。这便是史称的“二月来信”。朱德刚回到军部，毛泽东便让他看这封信。朱德边看信边皱起眉头。因为信中不仅要红军分散，还要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朱德锁眉不语，毛泽东背着手气呼呼地踱步，说：“我不离开！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见毛泽东对中央来信这个态度，朱德没有吭声，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在红四军的中央执行派是朱军长！”部队中不久就出现了性质较为严重的议论。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省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不料设置军委机构一事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矛盾，一场意想不到的争论把朱毛推到前台。

新任临时军委书记是上海来的中央军事部派遣干部刘安恭。作为中央军事部的“大员”，他与主持军事工作的朱德有更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就多一些交往。上任几天，刘安恭对毛泽东抵制中央分散部队和让朱毛离开军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非执行”

来判断是非。所以他断言道：“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战火由红四军的组织蔓延到个人头上。朱德和毛泽东便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

6月8日，红四军为暂避一股强敌而隐入一个叫白砂的地方待机时，前委准备召开会议进一步解决业已存在的红四军中的问题。

会场选择在一所旧校址里，一纵队的林彪司令员人马未到，却有飞马送到一封快信，写明送毛泽东的。如期举行会议时，林彪的信已在几位主要前委委员的手上传阅。

这封信对朱德进行了人身攻击。一串串文字重笔浓墨落在白纸上：“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

陈毅把目光投向朱德军长。朱德很坦然，像一尊雕塑静坐在那里，正专心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仿佛没听见这封刚读罢的信。

大家谈论军委机构，众说不一，各方纷争。就在这时，林彪发言了：“刚才大家看了我的信，这封给毛同志的信就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他放言成立军委是朱德的“阴谋”，是“希望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并进一步攻击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云云。在这次会议上，刘安恭也搬出教条据理力争。白砂会议上，前委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

“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军委怎么能行呢？”朱德很担心，因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指示。

“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毛泽东直抒己见。其间，毛泽东给了大家一个书面意见，并气愤难平，放言辞职：“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致信前委，一向沉稳的朱德也不甘示弱。朱德就在前委会上针对其信一条一条地辩。陈毅作为与朱毛心灵相通、朝夕与共的同志与朋友，只得在朱毛之间进行疏通。

但是,此时已不仅是做朱毛的工作,红军党内也已显分歧,势必要召开全体红四军党代表大会来彻底解决了。

召开红四军“七大”的提议,毛泽东同意,朱德拥护。而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不便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出面,前委于是决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工作。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在沉重的气氛中,陈毅代表前委对前一段工作,特别是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报告。嗣后,允许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林彪在争论的关键时候又站了起来。他在白砂会议前给毛泽东的信,在部队中已经传开。这时他又一次说:“朱德同志用手段拉拢部下,他支持军委攻击前委,是因为他觉得比不上毛泽东同志,又无别的解决办法,所以,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羁绊和管束,这是不对的。”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在栽刺害人。”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高彭山站了起来。

陈毅见战火骤起,就立即把话打断:“这是党的会议,不是骂大街!”他把高彭山批评了两句,转而又说:“林彪同志你也不对。党的问题,应当向组织报告。写信给私人,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再说你信中那些说法也有不对的,有些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

朱、毛在会议之初,基本上保持着沉默。白砂会议之后,前委决定在红四军“七大”之前,由朱、毛“各作一篇文章,更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意见”。

大约一周之后,毛泽东提笔写了一封长信,借给林彪回信的名义,表达了近日的思考。他将这场争论提到一个非常的高度:“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毛泽东在信中强调多次的有人“与党争权”,指的就是朱德。